

谭建丞先生的篆刻艺术

■姚新兴



释文 笔补造化(连款)



释文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

中国书画讲究“书画同源”、“诗书画”、“画外功夫，字外功夫”，元代以后文人画兴起，人们将印列入，因而便有了“诗书画印”之说。近代的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、潘天寿等，不仅是诗书画大师，而且刻印也是高手，今天我们要说的谭建丞先生也然。

谭建丞(1898—1995)，又名钧，号澄园，吴兴人，生前为西泠印社名誉社员、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、浙江省美术家协会顾问、浙江省篆刻研究会顾问、浙江省文史馆名誉馆员、湖州诗词学会会长、湖州书画院院长。

先生诗书画印均佳，被誉为继吴昌硕先生后又一位精擅“四绝”的艺术家和20世纪最后一位精擅“四绝”的艺术家。

上世纪70年代我与谭建丞先生相识，缘于一方印。彼时吴兴县文化局与双林镇政府共同举办了一次“吴兴县书画界人士座谈会”，我有幸被邀出席。座谈会组织者要求青年作者每人创作一件书画作品，会后请谭建丞先生进行评点。那天我写了一幅大字，内容为：“春已归来”。由于事先我曾请教过单晓天和应金阳先生，所以这张字章法较好。谭老看罢我写的那张字后说道：句子很好，章法不错，印章更佳。他问，此印是谁刻的，答之，我的老师。你的老师是谁？谭老又问，我说是上海的单晓天先生，他将信将疑，我将印送呈上，他很欣然，还专门谈及40年代他与邓散木、单晓天交往的故事。

1981年，谭老推荐我到湖州书画院工作，与先生朝夕相处，便开始有意识收集先生所刻之印蜕，多年下来，为数不少。1988年，澄师交我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他各个时期所刻印蜕，约有200多枚，先生言：“平时所刻大都不留痕，你喜欢就送你吧。”我将收集的印蜕粘成厚厚三册，后遇沙孟海先生，便请沙老题了“澄园印存”签条；尔后又延请乡贤沈迈士、费新我为“印存”题签。在我“言之再四”下，谭先生在这本“印存”前页，写了“学刻自述”。现在有关先生的篆刻艺术介绍，大者出于这个“印存”和“学刻自述”。

先生在“自述”中言：“童年好嬉，往往取硬年糕切为印，抟泥巴以为纽，稍长，常观吴昌硕、陆培之两位篆刻大家刻印，二公告，学治印必从汉人入手，后得《十钟山房印举》，渐觉心有所归。”从这段文字

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先生学篆刻之初，走的是正道。先生在“自述”又言：“中年后先后居上海、杭州，交游者如赵叔孺、黄葆戉、张葱玉、吴东迈、邓散木、潘天寿、张宗祥、吴弗之、诸乐三、韩登安、张鲁庵、唐醉石、来楚生等当代著名篆刻艺术家。”再言：“不知分宗论派，昌石乎，白石乎，皆我师也”。基于这一理念，先生这个时期的篆刻是博采众长，风格多样。有浙派、吴派、虞山派的影子。他还以楷书、隶书、甲骨文、钟鼎文、图案入印，异彩纷呈。1987年我曾根据谭老回忆，写就“谭建丞与邓散木”一文，刊登在《解放日报》。

人们常言先生笔墨厚重，大气磅礴，今言篆刻亦然。先生晚年(70岁后)的篆刻与书画一样，达到了“人印俱老”，厚重、老辣、粗犷，有天然粗放之美，已有自己的风貌。

先生一生勤奋，创作甚丰，先生曾言，诗书画印，对印用功最勤。先生刻印自10余岁开始至90多岁，创作时间跨度长，其一生刻印上万。现发现先生最早的印是27岁所刻朱文多字印：“正谊轩主人摹拓三代二汉六朝金石文字”，取法浙派，苍劲质朴(当然早的肯定有，目前还未发现而已，有许多印因没有边款，所以难断定其年代)；“文革”起，先生身处“逆境”，但刻印不断，先后刻就毛主席诗词二十首、毛主席词《沁园春·雪》等印谱多部。先生88岁刻“笔补造化”印，署款说：今后不再刻矣。然89岁后仍继续在刻。最晚的印是93岁所刻白文印：“宠为下”，识者云，“真力不衰，令人敬佩”。

我国篆刻史上刻印时间这么长的人极少(首先是起步早，还要高寿，齐白石是高寿，他活了93岁，而谭老93岁还在刻印)，旧时大多数印人在60岁后，便很少刻印，如刻印也往往由学生弟子代刀(谭老曾告，吴昌硕65岁后的印，大多是其子吴东迈代刻)，而谭老则9旬后还“操刀奏石”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谭先生的篆刻成就得益于名师指导，走正道(后来他也常常告诫年轻学习者，学印必从汉印入手)；加之他的勤奋和印外功夫(交游名家，博采众长，文字、书画等等)，使得他在诗书画印上并驾齐驱。有人言：如果将诗书画印分别设单项比赛，先生均可参加决赛；如果将诗书画印设为全能比赛，先生是冠军有力竞争者。

就兰亭学学科之“理”答姜寿田先生

■毛万宝

拙著《兰亭学探论》今年2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，出版后约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、中国书协“兰亭奖”理论评委姜寿田先生写书评，他欣然答应。然一二十天过去了，仍不见书评写出。于是同他电话联系，他告知，书评本来很好写，但有个观点与我不同，很苦恼，不知如何着笔。我说，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直接写成与我商榷的批判性书评也可以。我虽凡人，可这点雅量还是有的。一周后，收到他写成的书评，看后很高兴，决定放在《书法导报》刊发，且配发拙著之“后记”与拙著之书影。而今，寿田的书评(题为《凝注与探询：兰亭学的问鼎之作——评毛万宝新著〈兰亭学探论〉》)于《书法导报》4月19日发表了，再次感谢寿田对我致力兰亭学(还有早期书法美学)的首肯与称赞!

尽管如此，在反复琢磨寿田提出的不同观点之后，我觉得还应把心里话说出来，不然，很有可能被读者误以为我已“默认”寿田的观点。这里，我也“本着学术真诚”，提出自己的再思考，算是对寿田的“答复”吧!

寿田在书评的收尾部分，“本着学术真诚”，直率地认为我说兰亭学是一门学科的观点“并不合理”。他说：“学科构建需要围绕基本原理、概念、范畴、逻辑进行，像哲学、历史学、文化学、美学、文艺学乃至社会学学科构建，都无不围绕基本原理，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层面展开。相较而言，兰亭学研究，主要还是以知识文献系统研究为主体特征，而很难上升到形而上原理范畴层面，因而以学科视之并不合理。”读寿田这段话，我非常认同“相较而言”之前的判断，但不认同“相较而言”之后的判断。道理很简单，前面的判断合乎事实，而后面的判断则与事实有出入。我以为寿田考虑欠周全的地方，在于把对一级学科的要求，应用到三级学科上面了。

原来，寿田所列“哲学、历史学、文化学、美学、文艺学乃至社会学学科”，都属于大家公认的一级学科，而我笔下的兰亭学只是文化学与历史学下面的三级学科，兰亭学上面的二级学科是中国文化史研究。这点，我已于拙著《兰亭学探论》中的“导论”部分作过较详阐述，虽未出现“一级学科”“二级学科”与“三级学科”等字眼，但所指非常明确。我的原话是：“兰亭学这门学科该从属于哪门学科呢？也可说这是一个学科定位问题。我们想，如果单从它的重点研究对象——《兰亭序》着眼，一者可认为它从属于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魏晋文学研究，因为《兰亭序》这篇文章就是魏晋时期的散文作品之一。二者可认为它从属于中国书法史研究中的魏晋书法研究，因为《兰亭序》这通墨迹又是魏晋时期的行书作品之一；再考虑到《兰亭序》被后人尊为‘天下第一行书’，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中占有显赫地位，也可将兰亭学上升到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从属地位。遗憾的是，以上所述三种从属关系，三种理由并存，谁也涵盖不了谁，谁也取代不了谁，说明它们皆不可取。所以，我们还得另辟思路，同时考虑到兰亭学还要研究《兰亭序》之外的几个相关问题，如兰亭雅集研究、兰亭诗研究和兰亭接受研究等。当我们作整体观照时，就会发现，能够涵盖、统摄《兰亭序》文章、《兰亭序》书法与《兰亭序》相关问题研究的概念或称谓只能是‘文化’，由此，我们认为，兰亭学最直接的从属学科就是中国文化史研究。而中国文化史研究作为一门边缘学科，既是文化学的一个分支，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，这样，我们若为兰亭学作更高级的学科定位的话，当然也就可以说兰亭学同时从属于文化学与历史学。”

关于一级学科，“需要”做到“围绕基本原理、概念、范畴、逻辑进行”或“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层面展开”，我认为寿田的观点绝对正确，而且“我也这么认为”。但把这一“需要”，连降两级，直接用它来“审视”三级学科，在我看来，就没有多少道理了。因为三级学科就是三级学科，它有着不同于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的定义、要求与使命。兰亭学作为三级学科，寿田所言之“需要”，已由其上一级学科——文化学与历史学“代劳”并“完成”。兰亭学在三级学科的位置上，即便以“知识文献系统研究为主体特征”，也用不着“上升到形而上原理范畴层面”，而只需凭借自身的丰富性、复杂性与体系性展开系列具体问题研究。本想把这篇“答复”拉得长些，作些与分歧相关的“前理论”分析，比如是否该把“原则”(或“原理”“概念”“公式”“定理”等)作为“研究的出发点”？在承认“普遍性”的同时，允不允许“特殊性”的共存？对新生事物上取“苛求”立场好，还是取“宽容”立场好？等等，但又恐言多必失，结果是“道理”说透彻了，而朋友间的“感情”却没了。故而，就此打住，是非曲直且交给读者去评判吧! (作者系绍兴兰亭书法研究所原副所长)